



历史学与人类学：

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Wester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in the 20th Century

陆启宏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历史学与人类学：

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Wester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in the 20th Century

陆启宏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学与人类学: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陆启宏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8
ISBN 978-7-309-14348-5

I. ①历… II. ①陆… III. ①历史人类学-研究-西方国家-20世纪 IV. ①K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97178号

历史学与人类学: 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
陆启宏 著
责任编辑/赵楚月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36千
201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4348-5/K·698
定价: 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序言 “音调未定”的思想潮流

西方史学,源远流长,行至 20 世纪,具有悠久传统的西方史学发生了裂变,日渐剥离传统史学的脐带,自 19 世纪末新旧史学之争,启动了现当代西方史学的历史行程,迎来了 20 世纪西方史学瑰丽的篇章。

20 世纪西方史学的行程,概要之,大体上是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这一进程,随着社会发展而推陈,适合时代进步而更新。20 世纪以降,新史学一路走来,至 60 年代前后,曾一度雄踞史坛,风行一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新史学伸出双手,一只与自然科学牵手,另一只与社会科学相挽,交汇沟通,互补反馈,它再也不能“闭关自守”、束缚在单一的史学研究模式中。从现代美国新史学派创始人鲁滨逊所发出的史学需充分利用“新同盟军”的呐喊,到法国年鉴学派在《年鉴创刊词》中的“打破学科之间的围墙”的呼唤,其旨都在倡导跨学科与多学科的研究,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了现代史学的多个分支学科,比如心理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比较史学和影视史学等,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史学景观,“历史人类学”也就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其实,读陆启宏的《历史学与人类学:20 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便可知,历史人类学并不是历史学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两者之间仍是相当疏远的,但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则发生了变化,它们两者的相似性与共同性被指出,在各方举行的学术论坛上,探讨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的可能性,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催生出了“历史人类学”。年鉴学派史家雅克·勒高夫在《新史学》一文中阐述“史学的前途”时,提出了三个假设,其中的一个就是:“或许是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关于这一学科,保罗·韦纳称其为‘社会学史学’,而我更倾向于用‘历史人类学’这一名称。”(雅克·勒高夫:《新史学》,载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年,第 40 页)于是,“历史人类学”之雅名也就此登上了史坛。

那么,何谓历史人类学?学术研究当然不是从定义出发,但为一个学科正名也很重要。对此,毋容我置喙,且看启宏的陈述。他说,“历史人类学”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理解,故学者见解也各异。赵世瑜教授指出:“历史学有自己的历史人类学,人类学有自己的历史人类学。”倘如是,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历史人类学包括两个方面:人类学的历史化和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对人类学而言,历史人类学意味着人类学从共时性分析转向历时性分析;而对历史学而言,历史人类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不管怎样,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历史人类学有着诸多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两者之间的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显然有助于两个学科的发展。对此,我深以为然。由此想到,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现当代西方史学也随之变化和发展着,而历史人类学也将变化和发展。正如人类学家雅乐塔·宾尔沙克(阿莱塔·比尔扎克)所指出:“人类学与历史学已经以各自的方式从欧洲凿出了各式各样的思想潮流。今日,知识源头相当密切的这两个领域,都是具有理论性刺激的场所,也是众多传统争夺(或者说,屈服于、穿越以及融入)霸权之处,而且那里的关键词和概念也是具有高度争议性的。这些冲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目前这两门学科从中奋力地创造自己的未来。从属于同样的源流,受到同样的思想力量的浇灌,人类学与历史学如今面对同样的可能性。”(雅乐塔·宾尔沙克:《地方性知识、地方史:纪尔兹与超越纪尔兹》,载林·亨特主编:《新文化史》,江政宽译,麦田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写到这里,不由想到了多年前朱维铮先生写过的一篇《音调未定的传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他在文章引言中指出:“目前关于传统的种种诠释,音调如此错杂,蕴涵的价值判断又如此大异其趣,在可以望见的将来,争论诸方也未必能够达成共识。”朱氏将当时学界关于“传统”概念的争议,称为“音调未定”,这与上引宾氏关于当下“历史人类学”的争议,又何其相似乃尔,称其“音调未定”亦无可。因此,序题“音调未定的思想潮流”,想借此仿句,形容历史人类学当下的“学术生态”,庶几可矣。

本书所述虽然是史学理论,而不是历史叙事,但不难读。翻开本书,纲目清晰,无论是理论部分的解释还是实践部分的阐述,都是据充分,论严谨。当然,作为一本西方史学的理论著作,还可以说开去,比如作者的主体意识、关于话语权等要旨的阐发,那就更上一层楼了。不管怎样,我还是可以这样说,《历史学与人类学: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对不谙西方史学的读者来说,或许开辟了一个观察史学的窗口;对史学专业的工作者来说,也能启智益思,或许为本行研究插上了一对思维的翅膀;对像我这

样专治西方史学史的人来说,或许也可为西方史学史的现当代部分补遗,填补了一个空白。不信吗?请读读这本书吧。反正我信,且主意已定,在再次修订出版我主著的《西方史学史》第五版的时候,将在现当代西方史学部分上增添有关“历史人类学”的内容。

吾生启宏,在读博士研究生时,他做的学位论文是关于近代早期西欧的巫术问题,这种斑驳陆离的历史色调,关注下层民众的历史视野,也许与人类学的旨趣有着天然的联系,自此他心中埋下了人类学的“种子”,后论文经修改与增补,结成题为《近代早期西欧的巫术与巫术迫害》一书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记得2007年,我应《历史教学问题》主编王斯德先生之约,为该刊主持是年“当代西方史学新趋势讲座”,在筹划作者与选题时,我要启宏写历史人类学,他欣然同意了,其文《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历史人类学》(《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4期)出手不凡,令我满意,此文大概成了本书的雏形。这之后,他对于历史人类学的关注,一发而不可收,在全国性的史学理论会议上可以见到他提交的参会论文,大多与此相关联。就这样,他孜孜矻矻、潜心治学,刻苦努力了十多年,期间又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鼎力支持,现在终成硕果。作为他的老师,我希望作者继续努力、奋发有为,在学术上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回到正题。勒高夫在《新史学》一文的最后充满自信地说道:“史学史取得的引人注目的进展应当一浪推一浪,继续下去。”是的,就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而言亦然。回望历史,自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以来,毋庸置疑,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长足进步。观当下,山河温润,东风又启新征程。让我们与同道者一起,迈着新时代的步伐再出发,以开创中国西方史学史更加璀璨的明天!

是为序。

张广智

己亥春日于复旦书馨公寓

目 录

导 论 何谓历史人类学	1
-------------------	---

上篇 理论篇

第一章 文化的概念	19
第二章 文化的建构	37
第三章 结构与历史	52
第四章 历史的制作	64
第五章 微观与宏观	82

下篇 实践篇

第六章 社会人类学与历史人类学	98
第七章 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	111
第八章 年鉴学派与历史人类学	128
第九章 格尔兹人类学与历史人类学	155
第十章 新文化史与历史人类学	174
结 语	184
参考文献	196
后 记	219

导论 何谓历史人类学

一、历史学与人类学

一般认为,历史学和人类学^①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一个研究时间,一个研究空间;一个研究历史,一个研究结构;一个是历时性的研究,一个是共时性的研究。两者的研究方法也是不同的,历史学注重文字资料的研究,而人类学则注重田野考察和口头资料的研究。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认为:“历史学是从社会的有意识的表达方面来组织其资料的,而人类学则通过考察它们的无意识的基础来进行研究。”^②

事实上,早期的人类学并不排斥历史。无论是英美的古典进化论还是德国的文化传播论,无不是将文化置于历史中考察的,而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阿兹(Franz Boas)更是提出文化“必须在其独特的历史发展的语境中理解”^③。博阿兹认为存在着一种人类学的“神圣集束”,包括考古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民族志和民族学,这五者的结合基于如下的认识论假设,即

① 在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阿兹认为人类学分为四个分支: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考古学。在英国,与文化人类学相当的是“社会人类学”,在欧洲大陆则是“民族学”(ethnology)。“Ethnology”有时也被翻译为“人种学”,在本书中,我统一使用“民族学”,而只在引文中保留“人种学”。另一个与之相关且容易混淆的概念是“民族志”(ethnography)。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一书的导论中提到了“民族志”与“民族学”的区别:“民族志乃是对于被看作是一些独特的实体的人们共同体的观察与分析,因此民族志的目标是在于尽可能精确地记录不同人们共同的生活方式;至于民族学,则是利用民族志学家所提供的资料,以便进行比较研究。”“民族志”在所有国家中都具有相同的含义,它通常包含两个方面:田野工作(社会文化人类学家采用的方法)和民族志写作(人类学家写作的文章和著作)。在本书中,人类学主要是指文化(社会)人类学,而民族学则大致可以与文化(社会)人类学相互替换。

② 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一卷),谢维扬、俞宣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22页。

③ Davidson, J.,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Lambert, P. et al., eds., *Making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Practices of a Discipline*, Routledge, 2004, p.151.

“人类学事实上是‘历史学’的一种形式”。^①

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历史学和人类学逐渐分离,并确立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这种分离状态随着以英国人类学家布洛尼斯洛·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为代表的社会人类学提出田野工作方法而加剧了。

社会人类学家通过田野工作方法来认识被研究对象的制度、风俗和日常生活,这种田野工作方法包括研究者的观察以及被研究者的口述。社会人类学家认为,理解一种文化的关键是“长期近距离地观察当地社会,阐明社会结构各独立部分的功能,展现每个部分是如何结合并组成一个整体”。^②马林诺夫斯基将田野工作的方法原则归纳为三点:“首先,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与准则;其次,他应该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主要是指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而无须白人介入;最后,他得使用一些特殊方法来搜集、处理和核实他的证据。”^③因此,在马林诺夫斯基那里,田野工作是一种科学的方法。

自从出现田野工作以来,人类学家主要都是“从共时性的角度加以研究”,“一部分是因为最初以这种新方法进行研究的,都是没有文字记录的社会;一部分则是由于承袭涂尔干传统的社会人类学,其研究目的就是要以社会制度内在的功能连贯性来将其概念化。”^④人类学家通常在一个封闭的、“无污染”的土著社会中进行田野工作,他们否认这些土著社会在外来者(传教士、商人、殖民者等)到来之前存在历史,他们认为这些土著社会存在着某种结构,这些结构“使这些土著处于无时空的乐园中”。这种无时间性的模式被美国人类学家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称为“小船里的传教士”(missionary in the row boat)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传教士、商人、劳工招募者或政府官员带着圣经、穆穆袍(mumu)、烟草、钢斧或其他西方的事

① Cohn, B. S.,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The State of Pla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22, No.2, Apr., 1980, p.202. 但西佛曼(Marilyn Silverman)和格里福(P. H. Gulliver)认为:“对于鲍亚士(Boas)式文化史和新演化论的探究,以及1930年代、1940年代和1950年代所谓民族史的出现,刺激起某种历史的关怀,但是,这些很难视为我们目前关注的晚近历史人类学先驱。”(玛丽莲·西佛曼、P. H. 格里福:《历史人类学和民族志的传统——个人、历史和知识性的考量》,玛丽莲·西佛曼、P. H. 格里福编:《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的爱尔兰史个案研究》,贾士蘅译,麦田出版社,1999年,第21页)

② Davidson, J.,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Making History*, p.151.

③ 马凌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绍明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4页。

④ 克斯汀·海斯翠普编:《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贾士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页。

物来到一个岛屿,这个岛屿的社会和文化处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幻境之中,在新来者的冲击下,‘快乐的’土著的社会结构、价值和生活方式瓦解了”。^① 这种非历史性长期主导了英国的社会人类学。

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这种疏离状态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曾在文章中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历史学和人类学仍然是互相疏远的。但是情况到了60年代后期则发生了变化,伯克认为在英国有两个标志表明两者的结合:1966年社会人类学家协会在爱丁堡召开了主题为“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大会;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历史学家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和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各自出版了研究英国巫术史的重要著作,两本著作都受到了人类学的影响。^② 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可能比彼得·伯克所说的更早。1956年,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受人类学家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的邀请在曼彻斯特大学做了三次讲座,参与讨论的有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讲座的内容后来以《原始叛乱者》(*Primitive Rebels*)为名于1959年出版。^③

在人类学领域,马林诺夫斯基自己在晚年也提出使用功能论来研究历史和文化变迁。^④ 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后,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和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在他们的人类学研究中都关注历史。差不多在同样的时间,美国的人类学也开始关注历史。美国人类学家弗雷德·埃根(Fred Eggan)在1954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与美国文化人类学对文化过程和历史的兴趣结合起来。^⑤ 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鲁伯(Alfred L. Kroeber)则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关注人类学和历史的问题。^⑥

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隔阂由于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新理解而日益缩小,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菲雷(François Furet)认为这主要体现

① Cohn, B. S.,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The State of Pla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22, No.2, Apr., 1980, p.199.

② Burke, P., "Historians, Anthropologists, and Symbols", Ohnuki-Tierney, E., ed., *Culture Through Time: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68.

③ Hobsbawm, E., *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59, p.v.

④ 刘海涛:《论西方“历史人类学”及其学术环境》,《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第77页。

⑤ Eggan, F., "Social Anthropology and the Method of Controlled Comparis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56, No.5, Part 1, Oct., 1954, p.745.

⑥ Kroeber, A., *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在两个方面：“人类空间变成了一致的整体；与此同时，时间却不再是一致的了。”^①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对人类学的时间也进行了反思。人类学民族志尽管是共时性研究，但否认主体间的同时性，即否认民族志学者和研究对象之间拥有相同的历史时间和空间。人类学家约翰尼斯·费边(Johannes Fabian)将这种对同时性(coevalness)的否认称为人类学的“异时性”(allochronism)，传统的人类学家正是通过这种异时性强化了自我/他者以及西方/非西方之间的二分。^②

事实上，历史学和人类学有着相同的研究主题：“他者”(与我们所在的社会不同的社会)，只不过一个是由于时间上的间隔，而另一个是由于空间上的间隔。两者都致力于“将根植于一种时空中人的行动的意义向另一个时空的人进行阐释”，并最终需要以一种文学形式报告它们的研究结果。^③基思·托马斯指出了“我们社会的历史经验和土著社会的当代经验”之间的相似性。^④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正如地理距离使人类学家获得了疏远感，历史间隔也使历史学家怀有这种疏远感。”^⑤美国历史学家小威廉·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 Jr.)指出：

历史学者发现了与我们的世界在结构上不同的世界，那个世界里人的动机、荣誉感、日常工作和政治计算，是基于那些我们所不熟悉的关于人类社会和宇宙秩序的假设。许多历史巨著[例如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958年)、赫伊津哈的《中世纪的衰落》(1954年)、布洛赫的《封建社会》(1964年)、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拉杜里的《蒙塔尤》(1978年)]向我们展现了与巴厘、祖尼或特罗布里恩一样陌生的世界。历史学和人类学一样，致力于发现和展现人类的多样性，但是在时间中而非在空间中。这表明甚至我们祖先的生活也和我们有着很大的不同。^⑥

① 弗朗索瓦·菲雷：《历史学和人种学》，许明龙译，《史学理论》1987年第4期，第96页。

② Fabian, J.,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③ Cohn, B. S.,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The State of Pla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22, No.2, Apr., 1980, pp.198-199.

④ Thomas, K.,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Past and Present*, No.24, Apr., 1963, p.10.

⑤ 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王建华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86页。

⑥ Sewell, W. H., Jr., "History, Synchrony, and Culture: Reflections on the Work of Clifford Geertz",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p.179-180.

正是由于这种相似性,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成为可能。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早在1950年的“马雷特讲演”中就提出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他认为“历史方法的基本特征并不是事件的时间关系,而是事件的描述性综合;这是历史学与社会人类学共有的特征”,并指出“社会人类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区别是技术的区别、重点的区别、视角的区别,而不是方法和目标的区别”。^①1961年,埃文思-普里查德在曼彻斯特大学所做的讲演中更是指出:“社会学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充分意识到,任何事件既有独一无二的特征又有概括性的特征,在阐释它时,这两点都要考虑到。如果一个事实的独特性丧失了,那对它的概括就会显得太一般而没有什么价值。另一方面,如果不被视作有一定的规则性和连续性,视作属于事件某一类型,事件也就失去了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意义,所有这方面的事例都有许多共同特征。”^②埃文思-普里查德通过同时赋予“事件”独一无二和概括性的特征,将历史学和人类学连接了起来。英国的一些历史学家正是受到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影响,转而在研究中引入人类学的方法,其代表人物就是基思·托马斯。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成为必然。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新史学》中论述史学的前途时提出了三个假设,其中之一是:“或许是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关于这一学科保罗·韦纳称其为‘社会学史学’,而我则更倾向于用‘历史人类学’这一名称。”^③人类学家克劳斯·墨勒(Klaus E. Müller)指出:“历史人类学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一元论解释,这不是因为它当下有些时髦,而是因为它提供了最理想的学术环境,准确地说它把民族学和历史学联合起来,使我们无论是在历史背景下还是在当前环境中对人类社会的理解都更加合适,更加可行。”^④

二、以1981年《跨学科历史杂志》的讨论为例

历史人类学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开始反

① Evans-Pritchard, E. E., "Social Anthropology: Past and Present the Marett Lecture", *Man*, Vol. 50, Sep., 1950, p.122.

② 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论社会人类学》,冷凤彩译,梁永佳审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130—131页。

③ 雅克·勒高夫:《新史学》,雅克·勒高夫等编:《新史学》,姚蒙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40页。

④ 克劳斯·墨勒:《透析历史人类学》,约恩·吕森主编:《跨文化的争论:东西方名家论西方历史思想》,陈恒、张志平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思历史人类学,并展望其前景。1981年夏秋的两期《跨学科历史杂志》(*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以“新史学: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为题,对诸多历史领域的新发展进行了讨论,其中有一组(四篇)文章的主题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人类学和历史学”。

第一篇文章是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和人类学教授伯纳德·科恩(Bernard S. Cohn)的《朝向复合》。科恩认为,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十分紧密的,直到18世纪人类学仍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且深深根植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在西方的历史观念中,时间是线性的,因此历史主要就是年代学(chronology),这就使得历史学家可以根据时间编排“国王的统治、圣徒的传记以及那些影响政治的事件”。当西方进行海外殖民时,他们遇到了另一种不同的历史观。因此到了18世纪末,西方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就变成了“与欧洲空间上相隔的异域他者”。同时人类学成了一种无历史的学科,因为“它所研究的社会是不变的,或最多缓慢变动,这些社会没有历史,因为它们没有年代学”。但是,即使如此,19世纪时人类学的方法仍是“历史学的一种形式”。^①

到了19世纪,历史学和人类学逐渐分离,并确立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科恩指出:“当19世纪历史学家的兴趣领域日益倾向于民族国家时,人类学家则转为研究由欧洲国家所统治的殖民民族。欧洲民族的历史可以在档案中发现;海外被统治民族的风俗通过‘田野’发现。”^②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类学家试图“回到历史”,他们意识到这些殖民民族在遇到西方殖民者之前并非一成不变的,因此他们开始研究变迁的问题。科恩写道:“历史民族学家(ethnohistorian)的一个主要贡献是使得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日益意识到‘真实的土著’(authentic natives)——人类学调查的传统对象——在第一位民族志学者出现并记录其生活的文本和特征之前业已经历了大范围的变迁。”^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人类学的史学”。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认为,人类学开始关注变迁的问题,而历史学家则受到诸如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以及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等象征人类学家的影响;雅克·勒

① Cohn, B. S., "Toward a Rapprochement",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12, No.2, Autumn, 1981, pp.227-229.

② Ibid., p.231.

③ Ibid., p.235.

高夫更是期待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分离两百年之后相互靠近。科恩写道：

民族学者关注“重复的或预料的事件、节日……与生物的和家庭史相关的事件——出生、婚姻和死亡……历史社会中的礼拜元素……精神状态和心态的研究……魔法元素和克里斯玛的功能”，现在（它们）成了历史学家的主要兴趣。这些历史学家所关注的人类学涉及稳定性、结构、规律性，地方性的、共同的、小规模的内容，以及表象的、象征的和魔法的元素。^①

当然，很多历史学家对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仍有怀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人类学家用以理解和解释非欧世界的理论、模型和方法是否可以用以解释欧洲的历史。

科恩指出，找到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共同关心的主题是相对容易的，困难的是为历史人类学描绘出“一个共同的认识论空间”。一些历史学家强调叙事仍是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但是他们叙述的故事应该更完整，不仅包括事件，也包括结构。科恩最后总结并展望：“历史人类学家将是对诸文化的描绘，通过研究影响和改变结构的事件说明这些文化在历史时间中的位置，以及解释这些变化的重要性。这不会产生如19世纪的学者们所寻求的关于社会变迁的‘科学的’理论，而是一种关于变迁的历史。”^②

事实上，科恩在一年前的另一篇文章中更清晰地分析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科恩在文中指出，人类学的方法是共时性的，人类学是某种具体化和客体化的研究，而历时性的研究将使人类学家摆脱社会生活的客体化，而研究社会生活的建立和构建，因为任何文化都不是自然的客体，而是在历史进程中构建的。人们可以通过表象（representation）来研究文化构建的进程。^③科恩认为，“探究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结合的可能性，不仅是作为一个新的专业领域，也不仅是作为产生更多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的方法，而是作为重申这两门学科共有的认识论和主题的方法”；“历史学

① Cohn, B. S., "Toward a Rapprochement",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12, No.2, Autumn, 1981, pp.242-243.

② Ibid., p.252.

③ Cohn, B. S.,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The State of Pla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22, No.2, Apr., 1980, p.217.

能够在变得更人类学的同时变得更历史，而人类学在变得更历史的同时变得更人类学”。^①

第二篇文章是人类学家约翰·亚当斯(John W. Adams)的《一致、社区和异国情调》。亚当斯在开篇就指出历史人类学存在的问题：

人类学家的概念被断章取义且没有被完全理解，这些概念已经被研究北美殖民地的历史学家误用。部分困难在于将自己的领域和另一领域结合所带来的危险；部分困难则是因为历史学家不愿使用单一的解释。后一困难使得历史学家支持这些不易衡量的人类学概念。^②

同时，亚当斯也批评历史学家只关注诸如克利福德·格尔兹、维克多·特纳和玛丽·道格拉斯等少数人类学家，对其他具有同样重要性的人类学家则置之不顾，因此历史学家只是借鉴那些与历史学很相近的领域，即涉及观念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历史学家和人类家的研究兴趣从社区转向异国情调；而到了80年代，他们则更关注日常生活，而不是那些“特殊的、精英的和异国情调的”，因此他们的任务是“揭示位于常识之下的前提并为自然的行动提供合理性”。^③

亚当斯对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抱有强烈的怀疑，在文章最后他写道：“历史学必须对它的目标及其用来实现目标的方法有更多的反省。对人类学家而言，历史学家对理论缺乏兴趣仍然非常明显。但从另一个学科借鉴概念有时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希望，尤其是如果这些概念只是用一种轻率的方式被简单误用了。”^④

第三位作者是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她对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抱有更为积极的态度。在《过去的可能性》一文中，戴维斯认为人类学著作在四个方面对历史学家有所助益：“对社会互动的过程的近距离观察；解释象征行为的有趣方式；关于社会系统的各部分间如何契合的观点；以及那些来自与历史学家过去所研究的非常不同的文化的材料”。戴维斯要求历史学家关注那些人类学家非常熟悉的而历

① Cohn, B. S.,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The State of Pla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22, No.2, Apr., 1980, p.216.

② Adams, J. W., "Consensus, Community, and Exoticism",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12, No.2, Autumn, 1981, p.253.

③ Ibid., pp.260-261.

④ Ibid., p.265.

史学家却无法理解其意义的文本。因此,人类学提供给历史学解释模式,如戴维斯自己所言,人类学的解释“能够有助于历史学家,提供其研究类似材料的方式”。因此,戴维斯认为,我们在进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时,首先应该研究文本本身,然后可以借鉴人类学的解释模式。^①

很多历史学的研究受到了人类学的影响,如宗教史研究、交换的机制、社会性别体系等,其中最先得益于人类学的是被历史学家视为非理性和迷信的巫术。娜塔莉·戴维斯认为在引入了人类学方法后,“现在可以将巫术迫害视为中央权力与地方民众以及村民之间的一系列政治的、社会的、心理的和性别的斗争。同时也可以鉴别包括医学和仪式在内的许多行为,而这些行为通常被社区标定为邪术。”^②

娜塔莉·戴维斯也注意到历史学在借鉴人类学时存在的危险。首先,历史学家在借鉴人类学理论时都是折中主义的,但戴维斯认为这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戴维斯认为,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错误地将人类学解释和田野考察运用到历史学研究中。戴维斯写道:“我们借鉴人类学著作,不是为了寻求法则,而是寻求建议;不是为了寻求人类行为的普遍规则,而是寻求相关的比较。”戴维斯接着举了巫术史研究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不理解17世纪关于财产、身体、灵魂、健康和社会联系等的观念是如何影响人们相互间的恐惧的话,就不能将阿赞德人巫术控告的心理运用于欧洲的情况。”^③

最后,娜塔莉·戴维斯总结道,人类学不仅提供给历史研究新的研究路径,更重要的是扩大了“可能性”:“人类学对我的历史思考上的影响在于,不仅加深了我对不变的过去的理解,还有对人类经验多样性的认识。……人类学能够扩大可能性,帮助我们打开眼界,给予我们一个新的位置来看待过去并从早已熟知的历史文本中发现惊奇。”^④

最后一篇文章是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对娜塔莉·戴维斯文章的评论。在这篇简短的评论中,金斯伯格更多的是提出了自己对历史人类学的看法。金斯伯格认为,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是基于两个危机的影响:“关于历史的一种结构的、自信的观念的终结”“人类学家日益意识到土著文化自身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人类学对于历史学

① Davis, N. Z.,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Past”,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12, No.2, Autumn, 1981, pp.267-269.

② Ibid., p.270.

③ Ibid., pp.273-274.

④ Ibid., p.275.